

03 147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蔚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月

责任编辑	白 绛		
编 辑	徐守营	平生福	李兆才
审 阅	黄绍雄	乔蕊山	赵文章
	武新山	李全英	阮秉高
校 对	徐守营	平生福	李兆才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目 录

关于抗日战争前《蔚县民报》情况的回忆 武保德（1）

记早期妇女解放二、三事 武新山（16）

蔚县兴办职业学校的先行者——郝德明

..... 王久昌供稿 陈鸣胜整理（20）

第一高小的风波 周清溪（24）

* * * * *

蔚州鼓吹乐探源 张启维（27）

蔚县永宁寨秧歌班社考略 张启维（34）

* * * * *

蔚县煤炭开采史话 王德臻 安喜赋（47）

蔚县皮毛业的历史沿革 张启维（54）

蔚县皮毛行中的泰斗——宋福 张启维（58）

皮毛老艺人卢作卿 张启维（65）

蔚县酒乡——牛大人庄酿酒历史的追溯 周清溪（67）

蔚县最早的童工班——略谈暖泉“踩曲班” 周清溪（70）

漫话蔚县麻纸 周 洲（73）

蔚县笔乡——马家寨 周 洲（76）

略谈古郡花炮 青 西（78）

* * * * *

浅谈蔚县的经纪业 青 西（81）

“义福当”和蔚县的典当业 青 西（84）

特殊金融市场——银市 周清溪（87）

蔚县昔日骡帮	周 洲 (90)
小小豆腐店、行行出状元	周 洲 (93)
高升饭棚四代相传	青 西 (96)
名厨师刘潭	青 西 (100)

* * * * *

名刹、高僧、佛事活动	武新山 (103)
阐述铁林寺古刹梗概	炼承业 (111)
宏伟壮丽的唐贞观	李兆才 (116)
小巧玲珑的玉泉寺	李兆才 (121)
古城址——代王城	贾 晓 (127)
从蔚县博物馆初探蔚县的文物	李 杰 (129)
略谈蔚县博物馆收藏的明清人物影像	贾 晓 (131)

* * * * *

浅谈蔚州八景	周清溪 (135)
古代城奇观纪略	周 洲 (140)
金河风光	周清溪 (144)
河北山峰之首——小五台	张 江 (147)
金河处处尽奇观	张 江 (150)
漫话莲花池	周清溪 (152)
营镇奇葩——记西合营镇马家花园的兴衰	未 艾 (154)

* * * * *

蔚县历代修志始末	夏志强 (156)
杨震亚和他的《蔚县新志参考图》	周清溪 (159)

关于抗日战争前《蔚县民报》 情况的回忆

武保德

一、发行的起源

1930年，国民党蔚县县党部负责人王宪章、张宝珍等人开始筹组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党办报纸。当时报社地址设在县城西大街文庙内。由天津购置对开平面电力人力两用的印报机一架，老五号、三号、二号铅字各全套（每种皆有汉字一万一千余，五号字并附有相应的英文字母备用。如有特殊需要，如醒目标题、书皮、刊物封面等，使用一号字、特号字或其他字体时，即由技术师傅赵祥临时以木刻代替）。同时购置三号转盘脚踏机（俗称名片机）一架，可印16开版面，及排版时需要之其他工具付料若干。估计按照当时物价计算，用款约在2000元至3000元之间。又与天津售机商人谈妥，随机跟来技术师傅一人，月薪高达40元。

（当时蔚县职工工资的多寡，是以米价考虑的：“九·一八”事变前五年，小米是二元一斗，事变前的三年间突然降到了两斗半只需要一元。40元要折合小米4000斤）。

这些机器运回蔚县后已是1931年初，正式试车发行《蔚县周报》。内容主要是宣传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一些有关政策的决定和决议，新闻及县党务活动情况等。每周一张四开，内容都是官方消息，人民的声音是没有的。这些自然对读者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是“官办”，有党费津贴，报费定价是每年一元钱，订户是官方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各级学校、村政权等，基本上

属视派报性质，不订也得订，报费最终是人民负担的。

《周报》出版发行到1932年末或1933年初，就因时局变化而停刊。这实际上也是个穷衙门，报社的国民党人就不知去向了。可是剩下的设备，却仍然完好地存在，工人也没有辞退。据说邹希孟在《周报》停刊时，即利用私谊和乡亲关系，想接着办《民报》。

邹希孟名万章，以字行。他聪颖沉静，深谋远见，文学造诣很高。不是国民党员。他之所以放弃女子高小校长而不当，而来办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正确的方面，想以另一种文化教育的方式来为蔚县服务，另一是蔚县的知识分子较多，谋取职业者自然也多，当个校长有可能被别人以各种方式取代。邹希孟很明瞭这一点，对蔚县知识分子的排挤情况，他曾经和我谈过，但他不是说自己，而是以我的伯父武迪元当建设局长被人挤掉作例子。他明确地说，人与人的关系如此而已。因为他有这种世情观察基础，便看准了在蔚县办报是个冷门，别人是不会从办报纸而谋职业的。这当然也表现了他的思想能接受时代的需要，比别人先进一步。

从他后来努力办好《民报》的发展过程来看，应该说是一位为蔚县文教事业服务的人。他胸有成竹，精心设计，构成蓝图，向县写了报告，要求接收党报放弃不用的设备与工人（不包括职员）。时间大概是33年秋后的事，那时时局渐趋稳定，外患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暂趋冻结状态。国民党63军冯占海部已由蔚县调走，由脱离了西北军系开始依靠蒋介石的29军派来了县长葛润琴。邹希孟与县里达成了协议，并报省备案，条件是发行的报纸必须以一版的版面负责刊登县政府各机关的有关政令、法令、通报、通知、布告等（这样县的办公费用开支就有很大的节省而入私囊）。以此代价换取县支持同意报社在蔚县各行政村、学校、机关发售报纸。这样不订报纸的，就不能了解政府的法令、政令是什么，弄不好碰巧还有被处罚的可能。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某人呈请分配个小学教师的呈文送上后，是否能行，他必须从报纸上去找，不然就不知道下文是什么，县里是不会花邮费贴信封信纸送

批件给他的。也就是必须订，在某种情况下，在生活上还离不开这份报纸。

邹希孟这时将社址移到了县城北部财神庙街的瘟神庙内（庙产是属于全县酒行，也就是烧锅同业公会的。现在仍然存在的财神庙的西边是“双松禅林寺”，寺的西边就是报社所在地。越过一家香房，再西是药王庙，我到报社工作约年余，不知向何人交涉的，该庙亦归报社使用了）。33年秋后恢复的报纸，以《周刊》印行。不过内容与以前的《周报》显然有了区别，原因就是号称民办报纸，风格应有不同。但收入报费仅千元左右，再加上其他商业性的收入，可赚几百元，在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是入不敷出的。

邹希孟想出了主意，他决心将报纸改办成《蔚县民报》，这个“民”字代表了不是党报，而是人民舆论的喉舌，以改变人们对以前的《周报》的不良印象。办法就是增加报纸的期数，改成间日出一张，籍此改进而将售价提高到全年四元，后又升至五元，这样就在经济上扭亏为盈了。另外将第四版文艺版，力求刷新，兼容并包各种作品，这也是使报纸气氛活跃受人欢迎的改进方法。这年冬派徒工一人（即笔者本人）到北平学铸铅字。学完之后，购回铸字炉一台，新五号字模一万一千枚。报社自己铸字了，将已经陈旧而印刷不清的老五号字逐步替换下来。“七七事变”前二年已经部分的实现了这一计划：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字体小了每版内容可以增加约两千字的量。二是从报纸的外型看就近乎北平小报的模式了。这份改了名称的地方报纸还是要呈报国民党中宣部批准“发行许可”才行。批件号数必须刊在报头的某个地方。自33年秋起恢复发行准备阶段，就脱离国民党部一切直接指导关系。经济上自负盈亏，所登载的内容由报社社长法人负责，稿件一律不去事先送检。这就是《蔚县民报》的起源。但是必须每期送寄国民党中宣部一份备案备查。记得有一年，突然收到国民党中宣部一份公函，说：《蔚县民报》已数月之久不送呈了，要罚款。结果是又给它从存报中检出一份若干期寄去。

二、全社组织概况及人员更替变动

1. 职员8人：

社长邹希孟，邹病故后，刘荫轩继任。

总编辑马仁甫，马病故刘宝书接任。外勤记者刘荫轩（又名刘肇嘉），开始专任后兼任。

初校校对张初级。二校与三校由总编辑负责。“七·七”事变的前一年多二校交给笔者负责。

行政会计曹焕章，兼任广播收音工作。

营业会计史宣卿。

报纸发行，商业性营业裴珍甫。

广播新闻记录员开始田宗岳、曹焕章，以后我接替。

2. 工人10—12人：

技术师付赵祥。

排版师付马青山。

印刷工人苗清澄、李文甫（此人后辞去）。

排字工人赵焕、武秉权。

外活印刷工人宋大川、张永。

学徒工周元、王维毅。

3. 杂务工友2人。炊事员1人。

4. 非社编制的新闻报导、文学撰稿，特约专稿，作者无定额。

三、报纸版面分配及内容（一般情况下）

第一版：国际国内新闻、社论。

第二版：省、地方、邻县新闻，物价商情行市。

第三版：各级政府的政令、法令、通知、通报、批示等，其中主要是本县的。不足版时即将第四版不一定某种栏目的稿件填补。

第四版：文艺副刊，包罗万象，文史、地理、杂文、评论、

读者意见、古体诗、新诗、小说、外市报刊文章转载等等，无固定的编排模式和定期，而是根据总编意见，以及存稿情况而定。

报版夹缝也尽量利用，通常情况下都是些启事、广告、证件遗失声明等等，这是一笔额外收入。

四、每版稿件来源

第一版国际与国内重要新闻，基本上是靠收听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长波XGOA而来的（报社收音机功率不足，每天不管刮风下雨由曹焕章到县教育馆协助田宗岳负责记录，由田宗岳组成稿件，拟定标题送给编辑裁用。七·七事变前年余，这个任务就交给我来负责了）。社订购的平津大小报纸作参考。有时，特别是外电通讯社的报导，而中央台又不转播的内容，也根据需要而转载。这些新闻的标题很重要，新闻内容是不变的，而标题的提法、提要、用词，还有字号的大小，却代表了拟定人对新闻事物的认识与看法。

第二版除本社外勤记者每期固定采访若干新闻外，大部分是来自本县什么人都可随时投寄的稿件。从作者成份上说是小学教员较多，地域上甚至包括山沟里的事也有报导，譬如山火延烧，矿工事故等。有时也转载省和邻县的新闻，如本社和涿鹿县办的石印《间日报》互换，有些新闻就互相转载了。地方新闻内容中，从事物分类上说，包括诉讼案件，还有公职人员贪污或是政绩的，不同民俗的稿件。

第三版是县的各机关特别是政权部门要在报纸上刊登的政令法令等等，写在取来送去的循环本子上交报社登报，都是一字不差的原文。这种稿件送登单位是不付任何费用的。县还有个“自治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也有些稿件，主要是国民党的全国性的政令法令。

第四版名叫《萝川公园》，“萝川”是蔚县的名称。刊头是赵祥师付木板雕刻的一个公园，颇精巧。公园，那就是说谁都可以

投稿，但主要撰稿人，“杂谈”是田宗岳的固定文章；文学评论、文学欣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多半是邹希孟和马仁甫的大作，以后的刘宝书就差得多了；时事介绍与述评、田宗岳和笔者写过一些。报纸的其他职员就不大动笔了，不过张初级偶然写出的古体诗，却是精品，报社的工人也间或在某些问题上以文艺形式来写稿（这是给稿酬的），其中主要是师付马青山、徒工周元和王维毅。在外来稿件中，主要有县教育局长谢献（即谢炳文），写有关教育方面问题。教育馆的阮龙章，师范校长李明仕，后来的赵文甫都写过文章。在城内鼓楼后边住的臧献庭也投稿，但他那文言小说我后来发现，却是从明清小说中抄来的。还有个住在东街不挂牌的中医叫韩善治的，中文根底深厚，他用的是（我后来才学知）汉代一种和“赋”相近的叫做“连珠”体的写法，并且都是讲事物之间逻辑性的相互关系。我记得他用毛笔写在一个很厚的本子上，如果分段刊载，恐怕要用几年工夫，到事变时只登载了约有一半光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蔚县还是真有点文才的人。再有就是各学校的教师了。这都是给稿酬的，大约千字以上者按千字五角计算，千字以下者，不论多少，都给四角。总的说这笔开支是值得的。这里特别提到的是，报社技术在当时比外地来说是薄弱的，设备条件也差，不会制做铜板，珂罗版，报纸没有图片，便十分单调而不醒目。《民报》却仿学了外地报纸的长处代之以木刻，如第一版半漫画式的人物肖像，第四版的应景花卉等。赵祥师付对此，堪称速度既高，又维妙维肖。记得他刻过一次国民党五院长的肖像，可以说比外地报纸毫不逊色；他刻的“黄鹤楼”真有点气魄。可惜他却不能因而成名。

关于各版稿源如是，但既是报纸，就是代表某种意识形态的舆论工具，特别是社论（或称社评或论说）。可是依我看来，当时邹希孟相当聪明，将社论减少到不能再减少的程度。国际问题可以以知之甚少为籍口，国内的各种问题，可以写吧，可是他不敢发表看法，他的理由，我这报纸只是一个县的范围的报纸，不能一管而窥全豹。理由尽管说的通，但究竟不是实话，县内可

以写吧，他还是躲开当时人民的主要希望，避而不谈，以新闻填补了社论的篇幅。但蔚县的知识分子，却是有人要说话的，不过那就不是政论，而是事论了，我记得当时如水利建设问题，教育普及问题，实业开发问题，谷贱伤农问题，邹还是允许别人写的，稿责作者自负。他有一条信条，那就是不能给各级当局以难堪。这很显然，就是明哲保身，也保自身。但这样说却不能抹去他对蔚县文化教育事业的精力投资。后来的刘宝书继承加重了他的这一做法，使人脑火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凶焰嚣张的时候，刘竟用了半版的篇幅，写了一篇《城壕植莲记》的社论，社则社矣，论不沾边，真使人啼笑皆非。不过邹希孟故去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前进的变化。

五、报纸发行、营业及收支状况

蔚县有800个村庄，400多小学，在估计订阅《民报》率时，按百分之八十计算，两者合计是900多份，这是《民报》发行的基本对象。报纸发行的总数始终在1200份上下徘徊，其余的约300份，就是各级政府（县、区）、各类机关、城镇学校和教育馆。（教育馆为了张贴或方便群众起见，订3—5份）。县城和所有八大镇的商号，县域西北部的矿区，也有少数订阅的。个人订阅的20—30份之间，至于和其他报纸交换的因不计价款，就不算在内。这就是报纸销售总量的构成。

这1200份报纸全是收费的，按开始的4元计算，报费收入为4800元，按后来5元计算就是6000元，这是报社经常费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另外报社对外营业，承印各种表册、讲义、书籍、店簿、名片、卡片、贺年片、商标、仿单、信封信纸，私人启事、商业广告，偶而还承印军队的演习方案教材（这里随笔说一件后来的事，那是1937年秋八路军第一次解放蔚县时，杨成武将军派人找到了我，报社承印了彭德怀将军著作的《敌后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问题》小册子，约是300—500本，这也是报社的最后

一次印刷活动)。这些外活始终排得满满的，曾一度筹备开办石印而未果。工人是靠加班干活的，每加班3小时算半天，加班五小时算一天。工人是按月工资的日平均数发给，徒工因工资低，加倍发给。这种对外营业盈余是相当可观的，估计全年收入减去工本费之外，约在500元之上，这样报社全年的总收入就在有保证的5000元之上，甚至到6000元以上。社编制经费预算，就是以这个数字为基础计算出来的，但是我上边提到的报纸占百分之九十那个数字中，还该减去材料、原料、机器损耗、零件购置等成本1500元上下，这样计算，收入约在4000元至5000元之间。这笔收入中的开支是职员薪水总开支月在160元左右，工人及杂役工资开支月在100元左右，稿酬每月30余元。此外还有煤、水、灯、油、电话费、清洁工具、膳具更新等不能直接摊入报纸成本的，每月约30元左右（房子是不付租的，而是以代管名义使用）。这样如果再宽一点计算，每月的开支，约为320元，全年则为3800元左右，收入减去开支之后，还可有千元上下的剩余。如果再能精打细算，节约用材，广征客户印刷等，管理提高之后，报社盈余更多些。应当说明，这个报纸是不纳税的，前边提到的有关“第三版”的作法，从经济角度上看，比纳税还是合算。邹希孟的雄心计划是大发展，有朝一日变成正式的日报，在技术上取消向外地补购铅字，而由自己铸造，这是他的努力目标。据当时我知道，1937年日本占领蔚县之前，报社存款在2000元之上。（这还不包括县志编委会决定委托报社承印新续编县志而预付或垫借购买四号字模一付的费用1000元在内）。

不过这个报纸太贵了，试与北平的《实报》、《时言报》（都是四开小型报）作比较，它的印量大，销路广，成本低，但它们的零售价我记忆是每份两枚小铜板，就是五厘钱，即每月一角五分钱，全年是一元八角钱。《实报》的销路大，还有一钟代销派销的办法，施之于北平以外的地区，包销者的入价自然更低一些。蔚县城内西大街路南一家商店门口，就挂着《恒利派报社》的牌子，代销北平的各种报纸，负责人李子嘉，代销数量颇大）。

我们蔚县的《蔚县民报》则是两天出四开一张，这就少了一半，而价格上却又高出了一倍半还多。看来太玄了，可是《民报》还是年复一年的发行，并且似乎越办越兴旺，其原因，首先，它虽然确是民办，但总离不开官方的支持，有些相当于公报的性质；其次是地方性，本地人知本地事，外地报纸是没有这个条件的；第三那时无无线电收音机，是穷乡僻壤少见的或说根本没有的，蔚县的教育事业发达，有了报纸，本村教师会以各种形式将新闻告诉老百姓，有关国家大事的外地新闻，比外地来的报纸在时间上快两天到三天，人们更是先知先睹为快；第四是个奇怪的道理，就是“读报者不花钱，花钱者不读报”，报费是公费开支的，是老百姓出钱，白看报的人何乐而不看呢？第五，蔚县知识分子相对说多一些，这些知识分子对蔚县的地方事物，各有认识方法，态度有统一也有分歧与差异，就在《民报》上打上了咀架，或称笔杆仗，记得师范学校校长李明仕和另一个人，就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热闹得很，自然这也是吸引读者的另一不正规的方式。可能还有别的因素、如第四版文艺版面不能吹说繁花似锦，但总还是各有异彩，生气始终是向上的。特别是以文艺形式，而不是以政评的抗日文章，是很容易被人理解而接受的。

六、报社职员中主要人员的状况分析

办报纸或除了经营管理之外，主要是写什么说什么，代表谁来说与写。对于社会与国家所发生的事物要表态，这个表态就是所谓舆论。在人民尚不能在报纸上表达意见的时候，实际上报纸的意识形态还是在少数人手里操纵着，这些人就是报社社长，编辑记者，还有经常撰稿人。《蔚县周报》没有出过多少期，是党办报纸，时间很短，对蔚县人也只能留下与国民党同等的印象而已，还是存在了4—5年的《蔚县民报》起到了“地方报纸”的作用。尽管现在有人把《周报》和《民报》误为一事，实际上这是有原则不同的两种报纸。我这里要说的就是《民报》时期主要人员的

情况。由于当年我并没有想到今天会由我写个回忆，所以观察、闻知、问知，经历等是不会全面的，有些地方还可能是支离破碎的。

首先说《民报》创始人邹希孟，他担任社长直到去世前为止，有4年上下，如包括筹备阶段，时间可能更长一些，他月薪40元，（高于县立高小校长，相当于县的局长薪水）是他自己定的，不象别的机关学校负责人的薪水，要通过主管部门决定。前边也提到他的办报动机。服务桑梓这一点是蔚县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也是相标榜的口号，邹希孟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当了报社社长之后，可以说深居简出，只有外人拜访他的时候，他是从来也不回访的。他把报社涉外关系活动一切交给刘荫轩去应酬，自己一心把精力都投在报社的发展与经营的前途方向上去。在他当社长期间，编辑审定了的稿件，都必须由他再核定一遍。有时经过他的手之后，稿件就大大的改动了，可见他在稿件上有点事必躬亲的味道。他在言谈和报纸文章中好象有意地躲开当时国共的激烈对抗，对别人文章中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则不是绝对干涉，而是听其自然。他家庭出身富裕，是县立一高一班第一名毕业生，好学生与家庭环境，恐怕对他的处世哲学有重大的影响，守住、办好这个算为高薪而又有名誉的冷门，是他的终生企求。他鞠躬尽瘁于报社事业，晚年身体不好，去世时也只有五十多岁。对他可以说这样：在他的思想指导下的报纸，在政治方面是中立而保守型的，尤其在初期是这样。他肯用脑力会组装无线电广播收音机，是蔚县较老的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的懂电气的人。

继邹希孟之后的报社社长是刘荫轩，是邹的密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也就是能写个普通的短讯而已。他走上层路线，广交朋友处世随溜，在什么情况下都可应酬裕如。这适合在旧社会的官场里创造人脉，也成为他能完成外勤记者任务的条件。他是国民党员，原薪20元，在接了社长职务之后，他没有拿40元，改成了30元，这大概是他对自己的明智估价，也是从长远着想的。除了短讯新闻之外，从来也没见他写过一篇长点的评论性的文章。他对

国家大事，不甚了了，百年随时过，是他的处世原则。后来他在别人的怂恿下参加了汉奸维持会，不无顾忌地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奠基，其实是自欺欺人。后被处死，罪有应得。不过如果说他早就诚心反动，那也不实际，《民报》后期有关国是各版从标题到内容明显地增加了抗日的疾呼，他并没反对，就可资证明。这个人是个混时代，假聪明，混饭吃，毫无立场的人。

第一任编辑马仁甫，患有肺结核，40多岁就去世了，这个人对新鲜事物有敏感性，对国家和社会上的大事，脑子里有他的思想轮廓与体系。他可能是国民党员，不过我的看法，他对政党活动是不大感兴趣的。他的文章很有自觉意识与创新意识。他是总编辑审稿人，自己偶或也写短文，虽然不多，却是用语刻薄，旁侧讽刺性的妙文。他的哲学思想，恐怕与佛学有关，他与县城南关大寺的老和尚一聊半天，不知悟到了什么禅，那样有兴趣。马仁甫很明白报纸是舆论工具，但受其思想支配，他作为社论的当然撰稿者，要写高质量前进的社论就表现出受到限制。他想通过现实的矛盾冲突，进入空门。他对工作是负责的，凡是他经手付印的文章，他都负责到底，就在他弥留之际，犹口中喃喃，要改正哪个错误的地方。

第二任编辑刘宝书，这个人倒很简单，一句话就可概括，那就是不接受时代新鲜事物的世故老学究。他撰写的社论，我前边提到的那篇，是典型的不合时代的废话。他对变幻无常的事物视而不见，脑子空空如也。他的责任好象就是将别人写的文章，经过他的加工而更公式化或者说“八股化”，别的作用就再也没有了。我记忆中有两件事足见其守旧保守程度。有一次我无意之间说了一句对“胡适的学说是胡说”这个说法有了问号。可是这位老先生认为我是真的如此看法，对我大加称赞，说我少年老成，不受异论邪说的影响。另一次是邻居军队要印刷军事野外演习的方案教材，这是个充满军事术语的教材，因为第三校分工是总编辑的责任，虽说不是报纸稿件，而是商品，也要负责，拿底稿先叫他阅一下，一下吓住了他，他说这营业绝不能承揽，他没有边

干边学新东西的勇气。最后还是我以邻居的面子，一呵到底完成。他更大的缺点是办报而不读外市的报纸杂志，那怕是眼前需要的宏观知识，一说百不知，按说转载文章是应由他来确选的，可是到后来却成了我越俎代庖他也不反对。有个例子，一天报社同人从战争前线说起，我提到了《国闻周报》上登载过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写的《论太平洋战争》一文，这位老先生非要我找出来给他看，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报馆里的冬烘先生，可笑之甚。他年近60，日本快侵蔚时，他已经是准备辞退的人了。

还有一位田崇岳，他是教育馆和报社的兼职者，年岁30多，这个人聪明，有料事看问题的能力，记得有一次他曾说过：我们这个地方，说不定那一天这碗饭吃不成了。意思是日本人今天占这儿，明天占哪儿，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到我们这里来，言下对国事螭螭，感慨悲观，但也只是到此为止，该如何办，却无下文，斗争勇气是没法说的事。

这里说两位对办报方面有影响的人。我们报社的新闻广播收音记录员是田崇岳，因为他和教育馆的其他人都不會速记法，报社就将行政会计曹焕章还有以后的我先后派去帮助记录，其实我们二人对速记也是门外汉。晚上坐听的人不少，动笔的5—6人。各自以各人创造的符号加汉字记录下来，完了之后，大家往一起凑。这个笨法子，还没有出过原则性的错误，事后与平津大报核对，只有个别用字有舛错，并且不是关键。每天收听完了之后，似乎成了没有主持人的讨论会，其中有两位重要的发言者，一位是教育馆长谢献（炳文），一位是教育界的老前辈已经退职的赵文坛（翰章），对问题解说、质疑，认识判断，发展趋势的展望，各有独到的看法，对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影响。也包括了我們办报所应遵循的大方向。赵文坛老师（我在县立二高时是他的学生）的广知博识，使我们大家佩服而尊重。他和谢献对时局都有预知性的见解。日本人企图征服全中国，是我第一次听赵老师讲解什么是田中奏摺时听说的，爱国主义是他的口头禅，他使我的思想大受震动。谢献呢，年轻、脑筋活泼，记